



中国现当代著名作家文库

梁晓声

LIANG XIAO SHENG

代表作

中国现当代著名作家文库

梁晓声代表作

王 华 郝桂秀 谭歌斯 编

河南人民出版社

(豫)新登字 01 号

中国现当代著名作家文库

梁晓声代表作

责任编辑 曲哲

编者 王 华 郝桂秀 谭歌斯

河南人民出版社出版发行(郑州市农业路 73 号)

河南第一新华印刷厂印刷 新华书店经销

开本 850×1168 1/32 印张 21.125 插页 1 字数 489000

1994 年 1 月第 1 版 1994 年 1 月第 1 次印刷 印数 1—3000

ISBN7-215-02432-6/I·294 定价 16.90 元

前言

(一)

梁晓声是一位“耐得住寂寞”的青年作家。新时期以来，中国文坛新潮迭涌，热闹非凡，梁晓声却始终恪守着“凑近生活，真实地反映生活”的信念，坚韧地走自己的路。

梁晓声的文学创作始于1979年。在此之前，他也经历了所有作家都不曾缺少的文学创作的预备期。1949年9月22日，梁晓声出生在冰城哈尔滨的一个工人家庭。从小学三年级一直到中学都靠助学金维持学业。上学之余，他还要为帮助妈妈解决一家人的生存问题，去捡煤核、剥树皮，甚至于到农村去偷菜。这种困顿的生活，使梁晓声过早地体验了人生之艰难。梁晓声的母亲不仅具有中国普通妇女强韧的承担穷困生活的能力，而且还对文化充满着一种热望。她的头脑中装了很多故事。她讲故事时娓娓动听的声音和“富于情感的语调”，成为梁晓声儿时最快乐的精神享受。妈妈还让孩子们把小人书上的故事讲给她听，无论讲得多么荒唐可笑，母亲也认真地听。母亲的教育，使梁晓声的想象力及表述能力得到了培养和训练。

在文革这场大动乱中，梁晓声同千百万知青一样，被上山下乡的狂潮抛向了北大荒。在北大荒的生产建设兵团，梁晓声当过农

工、小学教员，还开过拖拉机、伐过木……。在那样一个特殊年代，人们的业余时间几乎被各种名目的会议所蚕食，再加上繁重的体力劳动，天天累得腰酸腿疼，但梁晓声却抱着对文学的专注的追求，靠着年轻时充沛的精力，常常伏在箱子上，一写就写到深夜，“第二天眼上泛着血丝照常出工”。就这样，他以一种忘我的“执著”写下了几十万字的東西。虽然真正发表的仅有三篇，但这七年的兵团生活给了他丰厚的馈赠，使他积累了丰富的丰富的人生经验，成为他初期创作的源泉。

1974年，梁晓声被推荐到上海复旦大学中文系创作专业学习。在那里，他有了较完整的时间去阅读书籍，整理思想，对社会、历史及人生予以冷静思索，思想臻于成熟。1977年大学毕业被分配到北京电影制片厂做编辑。1979年，他与别人合作的第一篇小说《美丽的姑娘》在《新港》文学月刊上发表，正式在小说界亮相，是为他的创作生涯的开始。待他在“一片神奇的土地上刮过一场暴风雪”之后，终于为人瞩目。也许是积蓄得太久了，也许艰辛的耕耘该到收获的季节了，此后梁晓声一发不可收拾，在不到十年的岁月里，他写下了《这是一片神奇的土地》、《今夜有暴风雪》、《为了收获》、《边境村纪实》、《雪城》等一部部“为荒原作证”的作品，写出了一代知青的命运。在褒扬纯洁向上的青春精神的同时，也对那段扭曲人性的畸形历史进行了批判。这些作品使梁晓声成了一个影响较大的青年作家。同时，他还写过一些以改革为题材的作品，以及如《从复旦到北影》等很有特色的、被他称为“自白体”的小说。

梁晓声是一个坚持现实主义的作家。他始终注视着历史，追踪着生活，在文学创作的道路上不停地求索。即使在“玩文学”、“玩小说”的恶俗之风甚嚣尘上之时，梁晓声也始终寂寞地独行，“笨拙地”开垦着自己生活中的处女地。到目前为止，他已经发表了七十

五篇作品。他常常回过头去对自己的作品严格地审视和挑剔,即使对那些在社会上有一定反响的力作也绝不放过。这种“严于律己”的为文态度使梁晓声在文学创作的道路上不断掘进。最近他的新作《失聪》(短篇)、《表弟》(中篇)等又相继问世。这足以证明梁晓声所说的他的“生活之源没有枯竭”。

(二)

知青文学是梁晓声生活与创作结合得最紧密的成果,也是使他蜚声文坛的代表作。《这是一片神奇的土地》、《今夜有暴风雪》、《为了收获》、《雪城》等反映知青命运的作品,带着黑土地的芳香,浓郁的北大荒的深沉,和着一代知青与命运抗争的激昂的旋律,扣击着读者的心扉,以一种新的视角展现了知青丰富而真实的生活,在批判历史的同时,浸透着一种高昂的诗意的赞美。那如急风暴雨式的知识青年上山下乡的热潮持续了十年之久,到了1979年,极“左”的一套破产后,又退潮般地迅速形成大返城的动人心魄的场面。究竟应当怎样看这一代人的命运?难道只是欠情欠债的失误和遗憾么?这十年中众多知青的作用,他们自身的历史、自身的价值应当怎样评价?当一些作家以一种批判的眼光去审视的时候,梁晓声在其作品中,从自己真挚的感情和对知青生活深切的体验出发,赞扬了百万知青幼稚而又纯洁的英雄主义和理想主义精神,用文学强调了这一代知识青年的自身的价值。

无庸讳言,“上山下乡”运动是极“左”的错误路线的产物,是对成百万知识青年命运的嘲弄。但众多的知青从祖国的四面八方云集在一起,结成一个新的团体,他们的思想、意志、热情、追求便也必然汇集起来,形成新的人文环境。加之垦荒,那最原始却具有一

种壮烈意味的事情也激发了他们未曾有过的激情和体验。在作者看来,不管是什么历史的原因,北大荒知青作为新一代垦荒者,以他们英勇无畏的英雄气概,开发了沉睡多年的土地,谱写了一曲动人心魄的豪迈圣洁的乐曲,这一历史功绩是不容忽视的。在《这是一片神奇的土地》中,李晓燕那已变态了的心灵在垦荒小分队中得到恢复;“摩尔人”王志刚为了爱情,也为了垦荒成功,冒着生命危险找到了涉过鬼沼的路,最后终于献身;小妹珊珊为了维持垦荒队员们的生存,寻找口粮,与受伤的小豹子一起陷设在魔鬼似的沼泽中……。在生与死的炼狱中,他们的精神得到了升华,既惊心动魄,又充满诗意;既悲怆、苍凉,又有着与大自然抗争的一股豪气。正如作者在结尾时所说:“经历了这样一种艰辛和喜悦的一代人,他们还惧怕什么呢?在征服大自然的过程中锻造了一代人的意志,培养着他们之间纯洁感情和社会责任感。”《今夜有暴风雪》中老政委孙国泰面对着即将离开北大荒的知青说:“你们是有功绩的,虽然这功绩不见得会被书写在历史上,但它会被历史所公正地承认的,……因为你们在北大荒的土地上留下了垦荒者的足迹!因为你们十年内打下了何止千百万吨粮食!……今后当社会评论到你们这一代人中最优秀的青年时,会说到这样一句话:‘他们曾在北大荒生活过’。”曹铁强对即将回城的郑亚茹说:“在同任何人谈起我们兵团战士在北大荒的十年历史时,不要抱怨,不要诅咒,不要自嘲和嘲笑,更不要诋毁……。我们付出和丧失了许多许多,可我们得到的还是要比失去的多,比失去的有分量。”这番话反映着作者的心声。1982年8月,梁晓声回到了他曾生活过十年的北大荒。他说:“我在对北大荒生活的回忆中发现了一种留恋在潜升,带着淡淡的惆怅。我们在北大荒得到的比失去的多,这就是我的主要感受。我觉得应该这样去总结我过去的生活道路。”这便是激发梁晓

声写知青和怎样去写知青的动因。他是以心灵的真实感触为依托，逐步展开真理性思索，从个人的视角去观照历史，以证实自己，寻找个人与历史统一的支点的。

正因为这样，梁晓声在充分表现青年们纯洁无私、勇于牺牲的同时，也相当深刻地展示了那段狂乱、黑暗的历史岁月对于人性的辗轧、践踏和扭曲。梁晓声的笔下刻画了一批像裴晓芸、小瓦匠单书文（《今夜有暴风雪》）、走资派的儿子王文君（《北大荒纪实》）这样的悲剧性人物。他们各自背着家庭出身或有政治历史问题的沉重包袱，受到种种歧视，在极度的自卑和压抑中生存。裴晓芸是作者着墨最多的一个人物，他对这个在重大的政治压力下苟延残喘地生活着的柔弱少女的内心世界做了精细的刻画。她，一个上海的小姑娘，平时把自己放在最不引人注目的角落，活得可怜。当她从连长曹铁强那里得到同情，继而萌生了爱情后，她那颗冰冷的心才慢慢地解冻。后来当她终于有资格持枪，作为一名边防战士守卫在哨位上时，却在爱的欢欣与想象中，在政治上的满足中，被大返城前夜的暴风雪冻僵，结束了她年轻而又悲剧性的一生。小瓦匠也是因家庭问题使得他丧失了男子的刚烈性格。王文君这位“走资派”的儿子，为了证明自己不是伪装积极，在一次发洪水时，仅仅为了十几条麻袋而丧生。过后被宣传为“宁为公字前进一步死，不为私字后退半步生”的典型。这些人物身上凝聚着梁晓声对那个践踏美、践踏人性的荒谬历史的强烈的愤怒与批判。这里特别要提到的是，在梁晓声的笔下最具悲剧色彩、刻着深重时代印记的，是那些在政治上出人头地的一群女知青的形象，如李晓燕（《这是一片神奇的土地》）、郑亚茹（《今夜有暴风雪》）、潘玉华（《北大荒纪实》）、姚玉慧（《雪城》）等。这批人极虔诚地接受极“左”思想，其忠诚、服从的观念，及其虔诚的程度几乎已达偏执和疯狂的顶峰。在这种狂

热与偏执中，扭曲着自己也扭曲着别人。对于她们，梁晓声由浅入深，由表及里地加以剖析，冷峻地审视融会着善意的同情，在一次次人物的塑造和刻画中，使这类女知青的形象分出了层次。李晓燕这位连副指导员，带着红卫兵的狂热来到兵团，违拗天性地要自己“革命化”，“左”而又“左”；肤色要黑黑的，不娇不艳；克制各种欲望，三年不探亲；对全连女知青提出倡议，不照镜子，不抹香脂，不穿花衣服……。将女性特点从形体到内心，统统封闭起来。这是红卫兵政治狂热的延续。至于郑亚茹，却是一个已经具有政治投机心理的女性。她锋芒毕露，处处显示自己的优越，把在政治上出人头地作为人生要义，有着极强烈的功利目的。她有着一定的驾驭生活的手腕，为了给曹铁强弄到一个上大学的名额，她四处奔走，多方拉关系；当她发现曹铁强对裴晓芸的同情后，妒火中烧，加倍地对裴晓芸那样的弱者，政治上的黑五类加以更无理的歧视和欺辱。当然，她也有姑娘的柔顺、热情，但这柔顺、热情已经被那个动乱的年代扭曲了。姚玉慧比前二人更复杂一些。由于她已经得到了营教导员的位置，她曾充分享受到了使用权力的快乐。在参加全团兴修水利的大战中，她的指令传达下去后，工地上一片欢呼，甚至有人高喊“教导员万岁！”这种情势和客观上的种种因素造就了她特殊的心理层次：更多的政治上的老成、持重、果敢；同时，伴随着这些，她也有着沉重的个性压抑，性格的畸形，心灵上的扭曲，及灵魂和现实的对立和由此引起的痛苦。营教导员的职位如同一件紧身衣，把她紧紧地束缚起来，她一举手，一投足和一个面部表情都是从政治需要及满足一种政治虚荣出发。她那唯一可以吐露心曲的日记本丢失了，被知青捡到并传阅。在她看来，心灵的暴露，便意味着营教导员的声誉、面子的贬损。因此，她凭借自己的威望，断然地以谎言维护了她在知青和领导心目中的地位；可是她的心里却被这不

敢正视自己灵魂的行为深深地灼痛。如果说姚玉慧的性格到这里已经揭示得较为充分的话,那么她与菅长之间那种荒唐的,甚至有些滑稽的性冲动行为,便是梁晓声将姚玉慧头上环绕着的那个“教导员”光环挑去,将她还原为人所用的最卓越的一笔,从这一笔读者自会体味荒谬的历史与人性冲突的悲剧程度!姚玉慧是梁晓声对这类女知青形象刻画得最完整、最深刻的人物。这是文革时期非常典型的形象,是一个时代“精神病态”的象征。高尔基说:“典型是一种时代现象。”这些人物命运紧紧地同时代精神、历史命运联系在一起,真实地再现了那段丑恶与美好,荒谬与庄严,痛苦与快乐的历史。

长篇小说《雪城》把镜头转向已经返回城市的知青。在“大返城”中,兵团的知青各奔东西,分别回到自己的城市和家庭。姚玉慧这个曾在兵团享有极大权力的人物,返城后一下子沦为待业青年。已经三十岁了,没有工作,没有恋爱,前途渺茫,在这种大的落差面前,她束手无策,孤独无援。刘大文带着对幸福家庭的美好希望返回城市,却落入了灾难的深渊,连最基本的衣食住行,维持温饱都得不到,只好到黑市去卖香烟。几百万知青怀着美好的愿望和幻想返回城市,以为城市会张开双臂拥抱他们。然而现实并非如此,他们被迫处于极困窘和尴尬的地位。在主观愿望与客观现实的矛盾面前,他们感到困惑、迷惘和悲伤。知青们返城后,尽管一时寻找不到自己的立足点,但必须寻找到自己的位置。这种寻找就体现了一种承受中的刚强。《雪城》的上半部基本上是这个格调。自下半部起,随着作者对城市生活的体味和现实生活中知青的处境变化,他笔下的人物形象变得纷纭复杂起来,个体户、改革家、公司经理……书中人物各以新的面目重新出现在城市舞台上。随着我国经济体制从计划经济向商品经济过渡后,人们的价值观念发生着

多元变化,过去人与人之间的温情消失了,金钱越来越显示出魅力。面对今天的现实,人们(包括当年的“知青”)在重新寻找生存的起点和人生的目标。作者梁晓声也与书中人物一样陷入一种茫然和痛苦之中。这一严酷的现实逼迫着梁晓声不得不以新的现实主义的眼光完成了《雪城》的下半部。历史发生了根本性的变化,作为有其特定历史内涵的“知青”群体已经分解,融化在改革的莽莽大潮之中了。生活正在揭开新的一页。

王蒙在评《今夜有暴风雪》时说:“在这篇小说里包含着一些比小说本身更重要的东西,那就是真实,那就是人生,那就是祖国大地载负的艰辛、荣耀,那就是一代青年的命运、悲喜、热情与血泪……。它不是用笔写的,而是用心用血和泪写的……它写的不是一己的悲欢离合,而是一代人的功勋与失误,欢乐和痛苦。”我们很难说梁晓声对“知青”生活已经洞彻一切,表现完满,甚至还可以因为他为了同龄人的自我肯定,为了给流逝了的青春寻求意义,而对知青生活中悲惨荒诞的一面揭示不足而有几分遗憾。但是,他的态度是诚恳认真的,他的小说是“用心用血和泪写的”,其不可抹煞的价值也就在这里。

(三)

我国实行改革开放政策后,经济形态和人的心态迅疾地发生着变化。现实生活的巨大变化刺激着梁晓声,使他的视线转向了改革大潮中的新生活。从1983年起,他陆续创作出一些以改革为题材的作品。其中最突出的是反映农村经济体制改革当中的农村生活及农民心态的作品,这些作品灌注着梁晓声对改革的深层思考及关切、热望。

张六指(《张六指的革命》)、罗志根(《罗村在京郊》)是两位思想性格截然不同的农民。他们都是农民中脑筋活络的人物,但个性不同。新经济政策的颁布,为他们提供了致富的前提。作者从致富观念入手,对这两位富户迥然不同的个性做出了鲜明的刻画。张六指以养奶牛成为超万元户,路子走得很正。这个人物的意义不在于他走上了致富之路,而在于他走上这条路的过程中,对种种问题的处理。如面对奶站站长的刁难,他宁肯自己吃亏,略施小计,打击了奶站站长那寄生者的气焰;致富以后,他发觉自己与乡亲的关系疏远了,便拿出钱来修学校,修筑公路,并为老弱病残户无偿送奶,为公益出资出力。他时时反省,不断克服小农意识,使自己逐步得到完善。他既努力寻求着自己的致富道路,又不断培养着关心集体的品格。在张六指的身上,显然渗透着作者的理想。但是这篇小说在艺术表现上略嫌陈旧,张六指有些土改时期农民的影子,多少有些理念化,它表明作者的观察有欠深刻。同张六指相反,罗志根则是一个自私、吝啬、贪婪、狡诈的农民。他在村人们还未“醒过来”的时候,凭着自己的“精明”操持起养鸡业而成为富裕户。他并不想给罗村人树立什么致富的样板,“他倒很希望罗村人永远地墨守那种‘正统农民’的观念”,使他与人们拉开更大的距离;他恨不得“所有发家的副业之路都留待他一人从从容容地一一去走。”这是一个极端利己主义的暴发户形象。他非常精明,然而他的精明全在算计别人上。他工于心计,利用心理战术从自己老婆的前情人手里得来鸡舍;他散布政策要变,蛊惑人心,坐收人家药材发财;他自家有了鸡瘟,便想法去瘟别人的鸡;别人刚刚考虑经营副业,他就妒嫉、忧虑、彻夜不眠。靠着这种“精明”的“损人利己”发家的农民,并不是改革与开放所期望的,然而却是发展商品经济无法避免的产儿。

以上两个人物的塑造,表现出梁晓声的目光并未停留于历史

行程的表面，而是深切地关注着改革中的人性动向。他企望着善与美，忧虑着丑与恶。以上小说的题材是改革的，底蕴却是伦理的。

在我国，农村的社会主义革命已经搞了数十年之久，可是在当今的改革中却仍可感到，对于老一辈的农民来说，克服小农经济的狭隘意识仍然是件十分艰难的事。那么，青年农民是否就会轻松地走上与他们父辈截然不同的道路呢？梁晓声在《旧庄院的废墟上》等作品中进入了这种关切性的思考。《旧庄院的废墟上》里的孙喜禄是刚刚富起来的青年农民。他的母亲年轻的时候曾被虎义山庄的旧庄主周成果霸占为妾。解放后，她重新回到自己的丈夫孙老闷的身边，生下了孙喜禄和他的三个姐姐。母亲的这番悲惨经历反而成为喜禄姐弟经常幻想的一种幸福：“要是现时还没解放，咱们都出生在老周家，不知该多么享福呢！”孙喜禄经常独自坐在虎义山庄的废墟上，想象着自己成了它的少庄主。他真的富起来了，首先要做的一件事就是在废墟上营造他冥思苦想多年的地主庄园。这便是一个八十年代青年的理想殿堂，这便是他的人生幻想的极限。贫穷和落后使他天然地以自己狭小天地所给予的标准作为衡量富足的尺度，并把它作为活着的奋斗目标。在这里，梁晓声冷静而深刻地揭示了中国农民那积淀了几千年的文化心理和价值取向，暗示了改革的艰巨与复杂性。

在《勇气》和《最后的晚餐》这两篇作品里，梁晓声的笔伸向了知识分子和政治体制。《勇气》写得较为深刻。梁晓声在这篇小说中写出了著名导演杜宣和有着深厚友谊共事多年的中年助手副导演葛翔之间的内在冲突，从而映照出一代知识分子的心态与社会运行机制之间出现的问题。由于缺乏一种优胜劣汰的公平的竞争机制，一大批年轻有为、有着创造意识的人被扼制，被压抑，被浪费了。可悲的是，在这严重的现实面前，很多知识分子却处在一

种“无意识”状态。四十五岁的葛翔本是一个事业心极强，业务上过硬的强手，但当他明显地感觉到了老导演杜宣陈旧的导演模式已不能满足观众的欣赏需求，想一显身手的时候，又是那么瞻前顾后，犹豫不决，缺乏竞争意识。当他精心修改了一个剧本，向领导交上一份申请独立导演的报告后，他又后悔不已，认为自己做了一件极端自私的事。于是他向领导提出改为与杜宣联合导演。不久，他又要求不再同杜宣一起导演，因为自己没有资格。作者向读者展示：固然像杜宣那样的名导演的“退”需要勇气，那么像葛翔这样的后起之秀的“进”，更需要勇气，需要与自己的传统观念和社会上多年积蓄的旧势力斗争，敢于承认和追求自我价值，并求得竞争的权力。葛翔是集美德和弱性于一身的典型的中国知识分子形象，是塑造得比较成功的。这篇作品看似平常，但提出了改革中成材环境和建立竞争机制的问题。作者通过徐小敏的嘴道出了这一点：“生命的活力依赖于新陈代谢，而艺术的发展却在于某一时期内两代人才更替当中的相互依存关系。要从这种存在着明显冲突中的人才更替过程中探寻到一种自然的、和谐的、彼此适应的节奏……”而这种节奏的产生无疑是依赖于一种民主、平等、和谐的竞争机制的诞生。这篇作品反映了作者的心声，同时也暴露了他的局限。梁晓声还是用理想主义的思考去强调人的自我抑制，以求得高尚的美德及人才交替过程的完满。然而中国改革面临的是一种根本的、体制上的革命，仅仅靠个人道德上的完善是于事无补的。

改革开放的深入，使人的人生观、道德观、价值观及生存方式猝然发生着根本性的变化。过去曾使几代人为之亢奋，为之奋斗的理想及所崇尚的集体主义精神和美德变得暗淡了，消逝了，伴着商品经济的发展，拜金主义的暗流亦在涌动。一代人所追求的理想主义受到莫大的冲击。对此梁晓声曾一度陷入忧郁困顿，他几乎接受

不了拜金主义狂潮下人的毫不掩饰的种种劣迹,以及人与人之间的赤裸裸的名利交易。他所怀恋的仍是温情的、善良无欺的人与人的关系和具有良好风尚的社会环境。因此他的作品过去呼唤,现在仍在呼唤真、善、美,追求人性的美好,不论社会如何变化,他都努力保持冷静的思考和积极参与的精神,继续在复杂多变的现实人生中去体味苦辣酸甜。

如果说梁晓声前期作品更多地偏重于体现文化革命及“知青”运动等时代的认识价值的话,1988年以后,他的作品更加注重对人文环境的开掘。从作品中可以看到,他一方面对社会上的一些丑陋现象和复杂残酷的现实人生予以揭示和展现;一方面仍执著地用笔去表现人的真、善、美,对人的命运进行深沉的思考和探索,并尽力浇灌着心中理想主义的花朵。在一次交谈中梁晓声说:“那个时代是我们理解过的时代,我准备迎接被世界强加的人性恶的现实。我知道生活已经是这样了,我在用放大镜去找还有多少真、善、美,我知道这是费力地做淘金工作。”

《表弟》是梁晓声继《从复旦到北影》之后再次触及的大学校园生活。所不同的是其中所描写的是新一代的中国大学生。肖冰和索瑶是小说中着意描写的两个来自不同环境,性格、命运迥异的大学生,他们都是通过艰难拼搏,以优异成绩考入高等院校的,但又都有着病态的、不够健全的心理。肖冰来自贫困、偏远的山区。当他一下子进入繁华都市和高等学府的时候,贫与富,落后与文明的强烈对比,就使他的心中失去了平衡,强烈的自卑感转化为强烈的孤傲和偏执。他对眼前的残酷现实十分敏感,心情却又十分沮丧和悲凉。这是一个被穷困扭曲了的青年,在云集着天之骄子时而浮躁,时而空虚,时而激情荡漾,时而纨绔成风的大学校园里,他时时被阴影笼罩,始终找不到自己真正的位置。而索瑶则纯情活泼,条

件优越，她是市长的女儿，各方面有着许多“叔叔”“伯母”的庇护。她优越得不能再优越了。在肖冰面前她充当圣母玛丽亚，她为能征服肖冰感到心理上的满足，但又时时被肖冰的怪戾所刺伤。然而他们都没能经受住环境的考验，由于毕业分配不顺利所造成的痛苦及俩人之间感情的纠葛，肖冰自杀了，索瑶因此精神分裂了……梁晓声就是这样不断地从新一代大学生身上透析他们潜在的软弱性，同时展现了当代大学生的生存环境所出现的种种困扰人心的问题。作者以这些天之骄子带着先天不足闯入突然多变而又纷繁复杂的七彩社会，所表现出种种的幼稚和软弱，不仅反映了中国教育的负面，也流露出作者对当代大学生中出现的种种状况和国家命运的一种焦虑。应当说这篇作品与梁晓声前期作品相比是有变化的，写出了人物性格的复杂性，对人物性格形成的多方面因素开掘较深。

《失聪》写的是一个刚刚被任命为文学艺术信托开发及研究所所长的人一夜间耳朵失聪变聋所引起的一系列怪诞可笑的事。一个循规蹈矩的人在任命当了所长后一夜间耳朵失聪，世界突然变得静悄悄了，然而对一切茫然不知所措的他不久便发觉，耳朵聋了对一个人来说不见得是什么不幸，他由于听不到别人说三道四，依然可以做出一副权威的样子发号施令，依旧可以使下级服从，人与人之间的恩恩怨怨少了，政治上的责任追究少了，似乎多了些安全系数……他变得超脱、深沉、幽默，处理起事情来更加显得独出心裁，与众不同。梁晓声的这个短篇具有强烈的讽刺意味，它深刻而准确地将现代人与环境间相互作用、相互矛盾的复杂现实以荒诞的形式表现出来。它在告诉我们，人常常被环境扭曲。人在变为非人这样一个主题在梁晓声的《灭顶》、《秋之殇》两篇作品中也做了生动的揭示。

(四)

梁晓声还有一类在读者中很有影响的小说,那就是《父亲》、《从复旦到北影》、《京华见闻录》、《白发卡》等“自白体”小说。严格地讲,“自白体”就是纪实文学中的一类。因此,这部分作品显而易见的特点便是不加虚构的真实。梁晓声坚信:“作家写的是什麼,读者是不太介意的。读者介意的是作家写了些什么真的东西没有?真的感情,真的思想,真的话。无论哪一方面,给予读者一点真,读者便不至于失望”(《我的追求》)。基于“求真”,梁晓声“常常想写一篇非常真实的小说”(《关于〈父亲〉的补遗》)1985年《小说选刊》第6期),其结果便是“自白体”的诞生。

《父亲》是梁晓声“自白体”小说的开篇。他是“为了自己,也是为了父亲写它的”(《关于〈父亲〉的补遗》)。如此单纯的写作目的,却使小说一举成功,1984年《父亲》荣获全国优秀短篇小说奖。究其原因就在于他把深刻的、严肃的历史反思浓缩在个人的家庭乃至亲人身上去表现,从而“非常真实”地表现了社会矛盾。梁晓声笔下的“父亲”真实得几乎从我们每个人的长辈身上都能看到他的影子。他年轻时的暴躁、自信、不求人,与年老后的卑微、谦恭、慈祥形成了强烈的反差,令人在敬重之余产生隐隐的心酸。年轻时,父亲以自己最大的努力和彻底的付出换取微薄的工资养活一个六七口人的大家庭。经济的拮据,劳作的辛苦,加之传统文化给他潜移默化的影响,扭曲了他的性情及价值观。他常常表现出易怒和暴躁,有时甚至愚昧无知。他是一个粗暴的家长,不容分说,不辨是非就给儿子一记终身难忘的耳光;他迷信保守,即使女儿生命垂危,也绝不允许去看西医,致使女儿夭折;他严守家长的自尊,毫不宽容,